

五经四书全译

(一)

陈襄民 刘太祥
葛培岭 张曼如
裴泽仁 付建萍
管曙光
张文学 郭振华
丰连根 李国征
注 译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五经四书全译

陈襄民 刘太祥
葛培岭 张曼如
裴泽仁 付建萍
管曙光 郭振华
张文学 李国征
丰连根
注 译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五经四书全译/陈襄民等译注. — 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2.7(重印)

ISBN 7-5348-1721-8

I. 五… II. 陈… III. ①四书—注释②五经—注释
IV. ①Z126.1②B222.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2333 号

责任编辑:袁 健 康秀华

责任校对:陈 文

出版社: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:109.75

字数:2 750 千字 **印数:**3 201—6 270 册

版次:2000 年 8 月第 1 版 **印次:**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书号:ISBN7-5348-1721-8/B·49 (全四册)**定价:**15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序 言

一

在中国,“现代化”的口号,很早以前即已提出,但现代化的进程却在长时期里甚为缓慢。政治、经济固是决定的条件,但思想、文化却是深层的原因。20世纪70年代末,中国政治发生了巨变,经济巨变随之而来。政治、经济的新发展,必须、也必然有文化上的新发展与之颉颃。所以80年代初期以后,出现了旷日持久的文化热,实乃势所必然,无法阻挡。

文化热的中心问题,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抉择。

文化热中的突出热点,则是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关怀。本书的最初问世即与这种时代的潮流密切相关。

本书的前身,是由陈襄民、裴泽仁、管曙光、张文学与笔者五人分工注译的《五经全译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,1993年重印。此次再版,在社方统筹下,五人对旧稿进行了认真的修订,同时增加了由刘太祥、张曼如、付建萍、郭振华、李国征五人分别注译的“四书”,合在一起,取名《五经四书全译》,重行付梓,以飨读者,并请读者赐教。

“五经”、“四书”是中国儒家的主要经典,而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学派,因而“五经”、“四书”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经典。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占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。中国古代图书分类,长期采用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的四分法,其中“经”即指“五

经”、“四书”等儒家经典及其研究著作。这不仅强调了儒经内容的独树一帜,而且也突出了其思想地位的卓尔不群。

比较来说,中国文化缺乏西方的那种极为强烈的彼岸关怀,即神灵崇拜和宗教意识;与之相对,却具有极为强烈的此岸关怀,即圣贤崇拜和人文意识。就世人最为尊崇的神、圣二端来说,西方首先崇神,而中国首先尊圣。西方的《圣经》,从实质上说,乃是神经;中国的儒经,才是地道的圣经。而“五经”、“四书”,便是“中国圣经”的主要代表。

二

经学的发展,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。

“五经”初始,原为“六经”,指的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部古书。这六种书早在孔子之前即已存在,但是无“经”的名称。“六经”之称始见于《庄子·天运》;《庄子·天道》中又有孔子谈论“十二经”的说法。但这两篇文章都不能肯定为庄子本人所作。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中则说:“孔子之前不得有经。”六经之中,《乐》经不见于后世。今文经学家说,《乐》经本无,附于《诗》中;古文经学家说,《乐》经本有,毁于秦火。揣之情理,后者近是。《乐》经既失,遂成“五经”。

“经”字何义?章太炎《国故论衡·文学总论》认为:“经者,编丝缀属之称。”即订书的丝麻,与“韦”(皮革)同功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认为:“织之从丝谓之经。”即织布用的纵线,与“纬”相对。《释名》一书则说:“经,径也”,即道路。从这些意思,可以引申为经纶、准则、经典。“经”用为经典,最早见于《国语·吴语》,其中有“挟经秉桴”之语,经即指兵书。战国时期,墨子之书被称为《墨经》,荀子书中曾提到《道经》。可见“经”字并不为儒家所专有。

春秋战国,百家争鸣,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。百家

之中,儒墨两家最为显要,世称显学。儒家之显,更胜于墨,孔子则是儒家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孔子曾对六经作过加工整理,所以,从此“六经”便纳于儒家的名下,并成了精神的权威。秦始皇统一中国,改行中央集权制,任用法家,焚书坑儒,儒学受到沉重的打击,儒经遭到严重的破坏。

汉朝建立之初,接受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,废除严刑峻法,崇尚黄老,与民休息。汉武帝时,为了巩固新的统一政权,采纳了著名学者董仲舒的建议,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从而确立了儒学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质和至高地位。同时董仲舒又赋予儒学以宗教的性质,提出了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天人感应”的宇宙图式,并构建“三纲五常”的伦理教条直接为政治服务。武帝采取非常措施,为儒家设官学,立“五经博士”,“五经”之名由是大彰。汉代又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严重分歧。东汉末年,郑玄打破今、古文的界限,综合百家,遍注群经,成为一代经学大师。

魏晋时期,统治者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,改变以经术取士的旧法,而代之以“九品中正制”,玄学大兴,佛、道两教也有很大发展,在汉代走入烦琐僵化歧途的儒学出现了玄学化和佛教化、道教化的明显倾向。

唐代,太宗命孔颖达作《五经正义》,御定发行。但唐朝思想不主一家,出现了儒、释、道三教的合流。儒经虽被列为科举考试内容,但明经科远不如进士科为世人所重。直到中唐韩愈、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,才使儒学得到一定的复苏。

宋朝,中央集权政治达到了新的高度,为之立论的儒学也得到了重大的发展,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理学。北宋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人,而创立关学的张载和创立洛学的程颢、程颐,则是理学的奠基者。南宋朱熹进一步发展洛学,创立闽学,达到了两宋理学的顶峰。朱熹把二程的天理论发展成为完整形态的理气论,认为理作为太极,是天地万物的本源;作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总称,又是伦

理道德的准则。理本气末,理先气后,气的流行生出天地万物。朱熹把理气的观念引入人性论,完善了洛学的心性学说,并提出了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著名口号,曾为历代统治者所大力宣扬。

朱熹一生的一项重要活动,是厘定理学经典。东汉时期,儒家经典于“五经”之外增加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,合为“七经”。唐代则以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和“三礼”(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)、“三传”(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)合称“九经”。重新疏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后,则有“十二经”之称。宋代又升《孟子》为经,遂成“十三经”。二程治经,特别推崇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二书和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二篇,朱熹则将四者明定为“四书”(亦名“四子书”,别称“学庸论孟”),并费时四十余年精心编著《四书章句集注》(简称《四书集注》),详尽发挥理学思想。从此,“四书”逐渐取代“五经”而被当作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,成为最权威的儒学经典,长期在学术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。

明代,新儒学渐渐出现了由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的转折。南宋陆九渊曾针对朱熹的理本体论,提出“心即理也”的重要命题,认为人的本心本来具有了一切善美之德。明代王守仁则发展了这一思想,提出“至善是心之本体”,“心外无物”,“心外无理”,将精神性的道德主体(心)提升为绝对的宇宙本体(理)。由此扩展,又提出了“致良知”的知行合一论,以对抗程朱的“格物致知”论。这样,便构成了一个极为缜密的心学体系,在儒学史上大放异彩。

从明朝正德年间至鸦片战争前夕,随着社会危机的爆发和资本主义的萌芽,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一股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想,即明清实学。其基本特征是“崇实黜虚”,鄙弃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,倡导经世致用。它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文化,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批判思潮。他们提倡经世致用,发展科学,富国强兵,积极参与社会改革。清代,由于统治者大搞文字狱,导致了“乾嘉之学”的考据训诂之风,成为经学的主流。学术大师戴震

是其卓越代表,他以“期于求是”为目标,对清代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同时他又极重义理,大胆提出了“辟程朱”的口号,指出程朱理学的实质是“以理杀人”,实际上宣告了理学的终结。

三

“五经”、“四书”做为儒家经典和传统文化的代表,具有包罗万象的特点,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。下面对之略作分述。

《易经》

此书最早只叫《易》,后来又叫《周易》,成为儒家经典后,才称《易经》。对于书名的含义,人们曾作过多种诠释。东汉魏伯阳说:“日月之谓易。”郑玄则认为它具有“易简”、“变易”和“不易”三种内含。《周易》是由很多人集体加工而成的,伏羲氏、周文王、周公、孔子,是其中的主要人物。

《易经》的内容由“经”与“传”两部分构成。“经”又分为卦、卦辞和爻辞三部分。卦是用来象征宇宙万物运动变化图式的一套符号系统。它由阴爻(--)和阳爻(—)两个基本符号相互配合而构成。卦有三爻卦和六爻卦两类。三爻卦共八个,即乾(☰)、坤(☷)、震(☳)、巽(☴)、坎(☵)、离(☲)、艮(☶)、兑(☱),合称八卦。六爻卦是由八卦两两重叠而成,共六十四个,也各有名称和符号,合称六十四卦。辞就是通常所说的“经文”或“古经”。卦辞、爻辞则分别揭示每卦、每爻的意义。“传”是解“经”的文字,共十篇,也称十翼。

阴、阳两爻的归纳,是一个重大的创造,它们反映了世界万物对立统一的关系,不妨视为天地万物的基因,它们的相互作用,造成了整个宇宙、人间的“运行不息,变化无穷”。

《易经》原是一部占筮之书,爻象和爻辞之间的对应安排,本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。人们为了揭开其间的“奥秘”,从“易传”开始,

逐渐将《易经》哲理化,虽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,但却形成了一套深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,极大地发展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,对中国人的政治、伦理、艺术、科学和文化生活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《尚书》

此书最早只叫《书》,到汉代改叫《尚书》,成为儒家经典后才称《书经》,而《尚书》之名仍然通用。“尚书”的意思,就是“上古之书”。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献资料汇编,其中保存了虞、夏、商、周各代的诰言、誓词和大事记等。由于年代久远,加之秦汉间兵火浩劫,篇什散佚甚多,今仅存 58 篇。

《尚书》的内容,可分为五类:一、国家大事,如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、《大禹谟》等;二、战争宣言,如《甘誓》、《胤征》、《费誓》等;三、政府文告,如《盘庚》、《金》、《大诰》等;四、名臣议论,如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、《五子之歌》等;五、其他著述,如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等。全书大旨,一是阐明仁君治民之道,二是阐明贤臣事君之道;而其核心思想则是敬天、明德、慎罚、保民四端。

围绕《尚书》,在汉代曾发生过十分激烈的今、古文之争。用当时的隶字书写的今文《尚书》29 篇,为汉初伏生所传。汉武帝末年,又在孔子旧宅发现了用古籀字书写的古文《尚书》45 篇。从此两派对立,长期争论。东晋初年,豫章内史梅颐又向晋元帝献上一本新的古文《尚书》58 篇,唐人孔颖达据此撰成《尚书正义》,遂成官方定本。宋代朱熹等开始怀疑它是伪作,而作伪者究系何人,学界则有皇甫湜、梅颐、王肃等不同说法。

《尚书》文字古奥,而价值很高。早在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时,其中的上古篇章,就对《尚书》多有援引。后人常把书中的名言警句做为持身处世的依据和标准。今天研究早期的出土文物,《尚书》仍是重要参证。

《诗经》

本书最初的名字是《诗》或《诗三百》,约编成于春秋中期。其

中包括从公元前 11 世纪到公元前 6 世纪 500 多年间的 305 首诗歌。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,其中描写了宏阔深邃的社会生活图画,政治讽谕、生产劳动、家庭生活、爱情婚姻、战争行役、祭祀宴饮、英雄业绩、民族历史等,无所不及。在艺术上,则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,形象生动,语言优美,声韵铿锵,成为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诗歌的宝贵源头。

古时论《诗》,有以“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”为内容的“六诗”之说。一般认为,其中“风、雅、颂”,讲的是诗的内容分类,“赋、比、兴”,讲的是诗的表现方法。“风”,又分十五国风,是风土乐调的地域划分。“雅”,意思是正,其诗多为贵族所作,其乐调是当时的“中原正音”,故称雅。雅又有大雅、小雅之分,可能是由于使用场合不同,大雅用于国家的大典仪式,小雅用于一般的朝廷宴会。“颂”,即歌颂、赞美,王侯祭祀时所用。其中又分周颂、鲁颂、商颂,分别为周王、鲁侯和殷商后代的祭歌。“赋”是直接的叙事、抒情,这是诗的基本手法。“比”是比喻、比拟。“兴”是兴起,启发,常用于发端,故也称起兴,大多是一种婉曲的联想或者象征。

古人普遍认为“诗与政通”,可以反映国家的兴衰治乱。与此相联,正统儒家特别强调诗的政治教化作用,希望用诗来“经夫妇,成孝敬,厚人伦,美教化,移风俗。”(《毛诗序》)今人则大多情志与艺术并重,对《诗经》的价值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和更深刻的把握。

《礼记》

在汉朝的“五经”里,《礼经》是指《仪礼》,东汉末年郑玄注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,合称“三礼”,皆为儒经,《礼经》一名遂不常见。唐朝的“五经”中,《礼》指《礼记》,沿传至今。

先秦时代,尚无《礼记》专书,只有许多阐述《仪礼》和谈礼的文字,称为“记”。据说,西汉的戴德曾删《古礼》204 篇而为 85 篇,称作《大戴礼记》。他的侄子戴圣则删《古礼》而为 49 篇,称作《小戴

礼记》。今天的《礼记》乃为后者。但这些记述是否可靠,争议颇多。

“三礼”之中,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枯燥而难懂,研究的人不多。《礼记》属于理论著作,生动多样,而且更适合历代王朝统治的需要,所以汉代以后研习日盛,最后不但从《仪礼》的附庸一变而蔚为大国,独立成“经”,而且比《仪礼》传扬更广。

《礼记》内容复杂,大致可分三类:一、理论文章,如《礼运》、《学记》、《乐记》等;二、关于各种礼仪、礼制、礼节、守则的杂记,如《祭义》、《昏义》等;三、有关礼和礼治的逸闻、故事,如《檀弓》等。此外,还有两篇记述礼法的文字,即《投壶》和《奔丧》。

贯穿全书的主旨,是儒家的礼治主义。儒家认为远古时代“天下为公”,十分美好。后来天下被君主私家占有,弊端百出。为维护社会秩序,便定出种种礼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。春秋时代,天下大乱,“礼坏乐崩”,为扭转危局,便需“克己复礼”。礼治主义是儒家最突出的政治主张。其中精华与糟粕杂糅,需作认真分辨。

《春秋左传》

《春秋经》之名比较少用,而且少有单行本,通常总是和它的注解本一起合编。其注解本现存三种: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谷梁传》,合称“春秋三传”。东汉以后,其中的《左传》流传最广,影响最大,唐代以后一说《春秋》,通常就同时包括《左传》,甚至主要是指《左传》。孔颖达编《五经正义》,正式取《春秋左传》以代《春秋》。

《春秋》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。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(公元前722年)到鲁哀公十四年(公元前481年)共242年间鲁国和其他诸侯国以及周王室的重要事件。此书本为鲁国史官所记国史,因《孟子》和《史记》都说是孔子所作,遂成流行观点。《左传》的作者,司马迁、班固都说是孔子同时代人左丘明,唐代以后学者对此多有异议,亦未成定论。

《左传》对《春秋》的解说，大体上有四种方式：一是对《春秋》经文直接加以解释说明；二是用事实补充说明，把《春秋》中对许多大事的简单概说，改为有头有尾的详细叙述；三是对《春秋》中的错误加以订正；四是有无经之传，即对《春秋》中没有记载的重要史实作出补写。所以，《左传》的历史价值，要比《春秋》更高。

旧时人们解《春秋》，特别强调其中的“微言大义”。微言，就是简单而微妙的措词；大义，就是大道理。这样的笔法便叫“春秋笔法”。《左传》对这种“微言大义”的索解，基本没有超出经文容许的范围，不像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，常常引伸过远，甚至凿空罗织。另外，《左传》为文倜傥恢诡，叙写栩栩如生，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。

《大学》

此书原为《礼记》第42篇。旧说是孔子的学生曾参所作，而曾参是从孔子那里听来，所以朱熹就把本文的第一大段总论部分作为“经”，又把后面进一步阐述总论的文字分成十章，让它们充当“传”，并且解释说，经文是“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”，“其传十章，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”（《大学章句》）。其实，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，《大学》的真正作者已无从考知。

除了区分“经”、“传”，朱熹还根据全文的逻辑关系，把原文中前面的两段文字移到后边，又把他认为有脱文的地方作了补写，所以《四书集注》中的《大学》便和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《大学》有所不同。

《大学》的精要，集中表现在第一大段的总论部分，具体可以概括为“三纲八目”。此段首句为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意思是说，大学教育的目标，在于让人所固有的真纯德性显现出来，在于使民众的品德不断进步（宋儒解“亲”为“新”），在于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。这三个方面，便是所谓“三纲领”。接着下面又论述了所谓“八条目”，即：格物，致知，诚意，正心，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。而其中的关键一环则是“修身”：“自天子以至于

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这便是一篇《大学》所要阐明的根本思想。

《中庸》

此书原是《礼记》的第31篇。作者是汉初人，但从司马迁直到朱熹，都说是孔子的孙子、战国人子思所作。

宋儒认为，《大学》是“入德之门”，《中庸》是“传授心法”，二者互为表里。《中庸》全篇，多引孔子之语，不好硬作“经”、“传”之分，朱熹便把它直接分为33章。又借杨时之言，指出第1章是全书的“体要”，其余各章分而论之。这样，其结构划分也就与《大学》有了相通之处。

《中庸》讲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。“中庸”二字今译，大致相当于“适度而得体”，朱熹的解释是“不偏不倚，无过不及”（《中庸章句》）。儒家认为对人、对事应该遵照这样的原则，掌握最佳状态，恰到好处。如果把“中庸之道”作为方法论抽象来看，它要求人们对事物准确把握其质的规定性，不过分，不欠缺，不走极端，不出偏差，确有一定的辩证思想。但是，如果把它放到历史中考察，便可以发现其真正目的是要求人们行事不得超越自己的名分、地位，须安分守己，“居易以俟命”，其实质则是维护封建秩序，保持长治久安。

另外，书中还讲了“博学”、“审问”、“慎思”、“明辨”、“笃行”的学习过程和认知方法。

《论语》

本书是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言行录，是在孔子死后70多年的战国时期，根据保存下来的孔子谈话记录整理编辑的。其作者是孔门弟子与再传弟子。“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

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他的政治学说以继承旧的“礼”为主，其道德学说则以创立

新的“仁”为主。他博学多才,教学生“六艺”,但更重视人格的培养。他认为“仁”乃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必备的基本品德。在此基础上,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思想体系——仁学。“仁”是孔子思想的核心。《论语》中的“仁”字出现计有 97 次之多,特别是其中的“仁者爱人”、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、“孝悌为仁之本”、“为仁由己”、“杀身以成仁”等语,突出显示了“仁”的基本精神、政治内涵、具体途径、自觉性质和它所要求的道德节操,而“天下归仁”,则是他最高的道德理想。

《论语》20 篇各自独立,内容上没有必然联系。它们广泛地显示了孔子在哲学、伦理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学、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思想观点,其中有许多传诵千古的睿语警言。

《论语》早就受到了世人的高度重视。东汉赵岐曾说:“《论语》者,五经之管辖,六艺之喉衿也。”(《孟子题辞》)朱熹则说:“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,未须理会经,先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中专意看他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)此外,《论语》是语录体,语言简练朴实、含蓄生动,有力地促进了它的广泛流传。

《孟子》

据《史记》记载,此书是孟子和他的学生万章、公孙丑所作。孟子(公元前 390 年—前 305 年),名轲,战国中期邹国人。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。孟子是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,元代以后被尊为“亚圣”,仅次于“至圣”孔子。《孟子》原为七篇,东汉赵岐作注,把每篇分为上、下二篇,今本《孟子》便成了十四篇。内容包括孟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、法律、哲学、伦理、教育等思想。

孔、孟都讲“仁义”,但比较起来,《论语》中更侧重讲“仁”,而《孟子》中更侧重讲“义”。“仁”是指人的根本品德,而“义”则是指从“仁”出发所采取的办事原则。孟子提出,“仁义”是人天生就有的,由此形成了他的“性善论”,这和荀子所提出的“性恶论”正好相反。二者都是对孔子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”的朴实思想的一种偏

离。

“仁政”思想在《孟子》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。这一思想是从性善论直接推导出来的：“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所谓“仁政”，就是以爱民之心施政，让老百姓安居乐业，与国君同乐。孟子提出，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（《尽心下》），安民是治国之本，因此人们便把孟子的政治思想称做“民本主义”。这在当时和后世，都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思想。由此出发，孟子进而讨厌战争，诅咒战争，认为对挑起战争的人应该治以重罪。

《孟子》行文气势磅礴，感情充沛，雄辩滔滔，富于感染力量。

四

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“五经”、“四书”等经典成了无可非议的金科玉律，逼使儒家学者只有通过笺注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，成为经学史上的一大景观。在这些经书及其诠释之中鲜明地体现着儒学的精神特质。这主要的就是“内圣外王”的理想诉求和“天人合一”的思维模式。从哲学角度来看，儒家高度重视从宇宙本体说明人的存在，以确立人的地位和价值，洋溢着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。“肯定人在宇宙间的超越地位，彰显人的主体精神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——这一切，说明儒家文化是围绕着‘人’而展开的。儒学实即人学。”（徐远和《儒学与东方文化》）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提出了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，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儒家思想彻底失去了它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，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大变化。文革期间，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儒学声威，扫地以尽。新时期以来，随着政治上的巨变，思想解放也迈开了步伐。在多元化的选择之中，儒学又出现了某种复兴的气象。

在对儒学的继承和张扬方面,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现代新儒家学派。其代表人物是一批思想活跃、在海内外有相当影响的港台和海外华裔学者。他们将自己的儒学复兴称作“儒学第三期发展”,以与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两大时期相接续。现代新儒学兴起的背景是西学东渐,儒学衰落,而其目标则是重振儒学,确立它在现代生活中的主导地位。有人将其思想性格概括为:一、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,二、中体西用的基本态度,三、道德上的哲学追求,四、推重直觉的思维方式。现代新儒学出现后,受到了不少人的严厉批评,这些人认为“儒学传统是一个有机整体”,对现代化只能起阻碍作用,现代化意味着对儒学的超越和克服,而绝非儒学的复兴。二者之间,相持不下。

儒学复兴现象的一个重要激发因素,是西方哲人和有识之士对东方文化的某种肯定和赞赏,他们的着眼点是在解决工业文明给社会带来的诸如犯罪、环境污染、道德沦丧等严重恶果。这表现了他们的求实精神和博大襟怀,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否定整个西方文化。而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迫切问题,则是如何加速实现现代化,在这点上,与西方有很大不同。显然,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求实精神和博大襟怀,敏锐识别并积极吸取对方的文化精要。凡是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东西,一定包含有某种超越现实局限的普遍性因素,有某种超越狭隘时空的核心和精髓。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创造过灿烂的东方文明,特别是古代文明,是伟大的;以科学、民主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创造了辉煌的西方文明,特别是现代文明,也是伟大的。另一方面,两者也都出现过自己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,但不应由此而对之全盘否定。双方都不应为补偏救弊、匡世济时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

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”东西方文化既有岐异与冲突的一面,也有略同与融洽的一面,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势不两立,你死我活,它们完全有可能通过积极、明智的交流和汲取,实现彼此的互补与

同的问题以至危机,双方都应撷取对方的优长,而摒弃自身的劣短。就中国来说,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,是注定要灭亡的了,但是它的许多思想精品,却完全可能经过“创造性转化”(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语)而获得新生。

这样来看,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,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距将不是越来越大,而是会相对减小;两种文化将不是一个吃掉或取代另一个,而是将出现一种更大规模、更深程度的历史性交融,从而形成多形态、多模式的具有“杂交优势”的世界新文化。中国新文化应该是这种世界新文化中十分灿烂的一枝,它将既具有色彩鲜明的民族特色,又具有光华朗畅的人类共性。这也许可以用魏征在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中对当时南、北文风的阐论来作比方,他说:

彼此好尚,各有异同:江左宫商发越,贵于清绮;河朔词义贞刚,重乎气质。气质则理胜其词,清绮则文过其意。理深者便于时用,文华者宜于咏歌。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。若能掇彼清音,简兹累句,各去所短,合其两长,则文质彬彬,尽善尽美矣。

唐代文学的极大繁荣,使魏征的遐想得到了美好的实现。我们的遐想是否也能得到美好实现呢?历史正变得越来越聪慧,相信它会给一个肯定的回答。

葛培岭

2000 年 6 月